

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

——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

[韩国] 金惠俊

(韩国国立釜山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

[摘要] 韩国译介中国文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几乎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步,此后由于战争和外交原因而停滞,70年代之后才逐渐恢复,韩国大学的中文系也开设多起来。80年代之后,韩国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数量大增,其中小说译介最多,散文、诗歌、剧本次之,另外,理论著作也开始得到译介。在韩国受到译介最多的现代作家是鲁迅、琼瑶和林语堂。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韩国 译介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1)05-0145-06

世纪之初,最先将中国现代文学^①发展的动向介绍到韩国来的人是梁白华。他翻译了日本人青木正儿的文章,^②并以《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为题在1920年11月的《开辟》上发表。之后,在1927年8月,柳基石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以青园为笔名在《东光》上连续登载。1929年1月,梁白华在开辟社翻译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③如此看来,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的翻译虽然历经几个发展的低潮,但仍可以说已具有80年代的发展历史了,特别是近年来,翻译出版活动表现得更为活跃。在此文中,我要参考自己所编的各种目录,介绍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理论著述和作品的翻译出版情况。

梁白华、丁来东等人的大力倡导,曾一度引起韩国社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但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开始受到重挫,特别是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工作完全陷入崩溃状态。虽然1945年光复后,曾出版了金光洲、李容瑾共译的《鲁迅小说选集》,但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0年韩国战争的爆发,两国的外交关系断绝,自此以后的数十年间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被迫中断,留下了一段空白。^④

自1970年代起,这一状态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72年2月,以尼克松访华为转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政策确立,随着这些变化,中韩两国的接触日益增加,与中国相关的领域也逐渐发展壮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以1972年为起点,中文系的数目迅速增加。虽然早在日

本殖民地时代汉城大学就设立了中文系，但是直到光复前不过只有9名毕业生，光复后，每年也不过只有一到三名毕业生。之后，外国语大学于1945年，成均馆大学于1955年先后设立了中文系，但是毕业生都并不多。^⑤到1972年，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大学三所大学先后设立中文系，之后每年都有增加。到现在为止，韩国全国内有11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中文课程。

随着中文系的增加，中文系毕业生逐年增加。由此培养了大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及精通中韩文翻译的人才。不仅如此，随着中文系毕业生的日益增加，自然而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读者层。与此相同的变化也体现在各种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学位产生趋势上。根据我的统计，到1980年以前为止的数十年间里，在韩国发表的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硕士论文不足十篇。但是如下图所示，进入1980年代以后，随着1972年以后升入大学的学生开始陆续取得硕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至于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以来每年有数篇，尤其是1993年和1996年各有12篇。

近20年间韩国国内取得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数^⑥

年度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硕士	2	2	6	3	5	8	6	11	18	17
博士	0	0	0	0	1	0	0	0	0	2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硕士	18	14	9	28	18	13	12	17	23	18
博士	2	1	7	12	3	5	12	6	6	5

理论著作方面。上述情况也同样反映在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著作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理论著作（包括评论）。

1980年以前，理论著作不超过10本，1980年以后，每年都有几本理论著作出版发行。最初，与作家介绍有关的书籍比较多，例如，《当代中国大陆作家评介（外）》（黄南翔 外，1985），《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外）》（彦火 外，1986）等等。到1990年前后文学史类的译书相继出现，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外）》（朱德发 外，1989），《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1991）等等。近来理论著作的翻译发展方向则趋向于对不同文体的专门介绍，如《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 向远，1998），《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李晓虹，2000）等等。

在对理论著述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1991）的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向中文系学生及一般大众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进展状况的最基本的著作。在这方面最初出版发行的是由韩国人尹永春所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尹永春，1949），这本书堪称是此方面的先驱之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篇幅上很有限制。之后，

历经数十年，进入 1980 年代才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论》（金时俊 李充阳，1987）。但是这本书作为一本文学史著作，无论在体制还是内容方面都有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延边朝鲜族同胞书写的文学史类书籍相继翻版发行，从而比较有体系的文学史得以普及。但是这些书籍体现出很强的中国教科书的特征，反映了较强的政治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1991）以其丰富的内容，完善的体系和文化现象优先的观点堪称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到目前为止，历经四次再版，对韩国中文学界的影响相当大。

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些学者翻译的日文版和英文版的著作。如：《鲁迅评传》（丸山升，1982），《中国现代文学史》（菊地三郎，1986），《中国文学の百年》（藤井省三，1995），《中国の栄光と悲惨：评传赵树理》（釜屋修，1999）；以及《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Paul G. Pickowicz，1991）。这些书籍的出版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观点，拓宽了信息渠道，摆脱了中国学者们一边倒的局限性。但是日文版，英文版书籍翻译的数目相对比较少，还需要做更多积极的努力。

小说方面。在文学作品翻译方面尤为鲜明的特点是小说的翻译占绝对优势。根据我的调查，迄今为止，小说的出版量达 400 余本（包括同一作品被重复出版，但不包含武侠小说），而出现的散文集约有 150 本，诗集约 25 本，剧本则不到 10 本。小说在各种文类作品的翻译中显示出绝对的优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较多。例如：小说原作出版的绝对数量比其它文体多；翻译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小说比诗歌更容易接近读者；能够满足读者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好奇心等等。即使是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小说也是常常被优先考虑的。

就小说发表的年度趋势看，1970 年代以前的译本约 10 本，1970 年代的译本合计不过十本而已。但进入 1980 年代后，译本的数量逐年增加，到 1980 年代后期，平均每年都有 10 多本译本出版发行。特别是 1992 年中韩建交后，小说的翻译得到飞跃性的发展，在 1992 年后的连续几年中每年都有 30 多本的译本出版发行。在 1997 年韩国经济风波前后，小说的翻译工作暂时呈现低潮，但 2000 年之后又呈现增长的趋势，小说翻译数量的演变，鲜明地体现了中韩两国关系的改善对文学创作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

仔细的观察后会发现，这里有几点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 1989 年中央日报社与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们合作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全集》。这一全集共 20 本，其中包括 16 本小说集，1 本散文集，1 本诗集，1 本剧本集和 1 本评论集。这些作品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时期，堪称是各个体裁的代表作品，翻译者大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各领域的专家，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容易被忽视的台湾作品也被收录到这本全集中来，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飞跃性的进展，是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分散性研究的具体化。在可靠的译者与可信的出版社积极合作下，这一全集得以出版发行，这必将给韩国的读者大众以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琼瑶小说的大量出版。自 1980 年代中后期起，每年都有两三部琼瑶的小说被翻译成韩文，但是并未在韩国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共鸣。1992 年，韩国的 SBS 电视台

将琼瑶的小说《金盏花》改编成电视剧，深受韩国观众的喜爱，自此琼瑶的小说被大量译成韩文，仅1992年一年间就有24本译本出版发行。迄今为止约有75本译本被出版发行。我以为，琼瑶的全部小说几乎都翻译出版，另外还影响到与琼瑶的风格相似的大众作家朱秀娟、李碧华等人的小说也被大量翻译成韩文。^⑦

第三点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小说翻译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鲁迅小说不断被重复翻译出版的问题。其实收录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鲁迅的小说不过只有33篇，完全可以将其编辑在一本书里出版发行。但是目前为止已出版的鲁迅的小说却已达60本，这一点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因其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和知名度。换句话说，鲁迅的作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具有极高的代表性，读者渴望了解鲁迅的小说，因此不仅出版社要考虑这种需要，译者也会因此产生不断对其更新，重译的冲动。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大量的优秀作品，这种对特定作家的作品过分强调的现象是否可取，这一点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前面我已经介绍过，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小说被大量翻译，同时在小说作品中，鲁迅和琼瑶的作品被集中地大量翻译。这堪称是一种偏重现象，与此类似的偏重现象也出现在其它方面。其中的一点是严肃文学作品大多局限于大陆，而大众文学作品则主要来自台湾、香港。换句话说，除大众文学外，台湾、香港的严肃文学作品很少被介绍到韩国来。再有一点是就作品的时间而言。大多集中在1949年以前和1976年以后，而1949年—1976年间的作品相对少见。

散文方面。小说领域中反映出的过于偏重某一位作家的情况在散文领域也同样存在。不同之处在于散文领域偏重的不是鲁迅等人的散文，而是林语堂的散文。根据我的调查，在已出版的近150本散文集中林语堂的散文占了一半，且这之中，仅以《生活的艺术》命名的散文就有20本。1980年代以前翻译的中国散文绝大多数是林语堂的作品。尽管在1950年代到1990年代间，把林语堂的新作翻成韩文的情况并不多，但这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几本林语堂的散文出版发行。林语堂的散文在韩国盛行的原因大概不仅在于其作品本身，还与他曾被推举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以及后半生主要活动于海外，从事英文创作，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等因素有着密切地关系。

与林语堂相比，鲁迅散文的韩文译本相对不多，但仍有10多本，特别是李旭渊编译的《朝花夕拾（外）》（鲁迅，1991）堪称是散文界的最畅销书，深受读者喜爱。此外，载入韩国中学课本中的《背影》的作者朱自清的散文集以及郭沫若的四本自传也都被翻译成韩文。鲁迅、朱自清、郁达夫等20世纪前期的优秀散文家的作品虽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介绍到韩国来，但毕竟还可以见到。而令人遗憾的是像杨朔、秦牧、刘白羽等20世纪中期以及贾平凹、王英琦等世纪后期的散文名家的作品在韩国几乎找不到。令人略感安慰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散文集翻译的数量逐年增加，且并非集中于某一位散文家的作品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例如：风靡于台湾和大陆的三毛，席慕蓉的作品已有几本被介绍到韩国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2000）也刚刚在韩国出版。这

不仅是出版社考虑商业利润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这些与生活紧密联系的作品最容易在读者中产生共鸣。^⑧这些作品有助于帮助韩国读者摆脱对中国现代文学持有的茫然的印象“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和韩国文学一样是人类生活的整体表现。

诗歌与剧本方面。与小说和散文相比，对中国现代诗和现代剧作的翻译显得大为不足。根据我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出版的诗集只有 25 本左右。在韩国国内，都鍾焕、李海仁等一部分诗人的作品曾风靡一时，《创批诗集丛书》已突破了 200 本，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有关学者专家有必要做更多的努力。换句话说，在有众多爱好诗的读者的韩国，中国现代诗的翻译数量还远远不够。将韩文版的英文诗、法文诗与中文诗相比较的话，更明确地知道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中文现代诗的翻译领域仍有几点值得关注的地方。曾先是许世旭翻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76）等几本诗集。许世旭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诗人，无论是在选诗方面还是在翻译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其次是艾青和北岛的诗有几本已被译成韩文出版。这也许与艾青和北岛都曾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有关。最后一点是近年来顾城、傅天琳、舒婷等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韩文。由此看来，对中国现代诗的翻译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与诗相比，剧本的翻译更显得惨淡。仅有《雷雨/茶馆》（曹禺/老舍，1989）等不足十部，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曹禺的《雷雨》、《原野》、《日出》三部作品都已被译成韩文。剧本不仅是阅读的对象，同时也是为演出服务的，因此，与其它文学体裁相比，剧本有不利之处。另外，此间在韩国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攻读戏剧文学的人士很少，这也是剧本不能被大量介绍到韩国来的原因之一。光复之后和几年之前，曹禺的《雷雨》在韩国上演时，曾两度都获得众多韩国观众的好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现代剧作予以更多的关注。出版社考虑到自身的商业利益也一定会予以出版，当然，在这方面，我们学术界以及相关领域应首先作出积极地努力。

如前面所述，根据我的调查，到目前为止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韩文著述大致有理论书 60 本，小说 400 本，散文 150 本，诗集 25 本，剧本 10 本，合计不足 650 本。单纯从数字上看，650 本似乎已经很多，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个数字并不多。况且，在这些译本中有相当一部分被重复翻译，如：鲁迅，琼瑶，林语堂的一部分作品，还有一些完全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的低级的大众小说。认识到这些问题后，不难发现，事实上，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做的翻译工作还远远不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中央日报社编纂的全集外，其余大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翻译大都处于无系统的零散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出版社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学者专家的无计划的翻译造成的。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书籍较多的出版社有弘益出版社（15 本），油友社（8 本），青年社（8 本），日月书阁（8 本），五车书（6 本），高丽苑（6 本），明文堂（6 本），惠园出版社（5 本），白山书堂（5 本）。其中弘益出版社出

版的主要是琼瑶的小说以及一些大众小说，其余的出版社出版的数量少，所以很难找到共同点。因此，学术界与出版界共同合作，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译介工作对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至关重要。

最后想谈一下我个人的一点希望。今年10月13日，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宣布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人高行健。高行健（1940-）以中篇小说《寒夜的星晨》（1979年）和剧本《绝对信号》（1982）为起点先后发表了《车站》、《野人》、《模仿者》、《躲雨》、《行路难》、《客巴拉山》、《独白》等剧作和《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彼岸》、《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小说。到目前为止已发表中篇小说四篇，剧本十六篇，文艺评选三本，共四百余篇文章。他的作品内容大多批判现实的不调和，体现一种反抗意识，辨用现代主义手法，打破现存的时间配置、舞台布局的常规。因此他的作品发表时常引起争议。但是他并不被一般大众读者熟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出乎很多专家的意料。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象林语堂、艾青、北岛一样，预计近期在韩国将有大量的他的作品出现，预计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情况将为韩国读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再认识的契机。特别是他所辨用的现代主义手法，将有助于改变韩国人一提起中国文学便想起李白、杜甫、《西游记》、《三国演义》，以及鲁迅、琼瑶、《阿Q正传》、《生活的艺术》的意识。就此方面而言，不管对他本人以及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我期待他的获奖能为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广义的，指“中国现当代文学”。

②青木正儿的文章曾在1920年9月11日日本的《支那》期刊的创刊号到第3号上登载。

③④金时俊，《在韩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况与展望》，《中国语文学志》第4辑，汉城：中国语文学会，1997.12，第1—8页。

⑤李章佑，《中国文学研究史长编（15）在韩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学》第15辑，庆山：岭南中国语文学会，1988.12，第503—515页。

⑥金惠俊，《韩国国内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

位论文目录》（2000.10.22），<http://users.sinology.org/dodami/KHJ/Catalogues.htm>。

⑦《神雕侠侣》（金庸）等等武侠小说的大量出版也是很值得注意。对于1990年代以前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请参看李致洙，《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介绍与影响》，《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12号，汉城：中国小说研究会，1992，第1—19页。

⑧我也在我的网页<http://users.sinology.org/dodami>上每周翻译连载1990年代中国散文作品，颇受访问者的欢迎。

（责任编辑 申洁玲）